

反“目的论”: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

卞友江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阿尔都塞早期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问题所展开的与当时各种形式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辩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理论探讨。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阿尔都塞界定为表现因果观,而《资本论》以实践形式隐藏着的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改造”,即由表现因果观转向结构因果观或者“多元辩证法”。马克思辩证法区别于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传统哲学之处在于,它将认识过程中的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作了根本性区分,否定了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各种“二元对立”模式,从而实现了一场认识论的根本转移,即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目的论”转向反“目的论”,从历时认识走向共时认识。历史由以往简单的线性脉络走向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脉络,任何认识都是建立在既与的复杂整体的特殊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的结构因果观意在表明各种宏大历史的终结,其对认识过程的祛魅,意义不在于揭露了意识形态本身的虚假性,而在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与人们复杂的日常生活的合二为一。尽管阿尔都塞对当时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潮流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整体”而遁入虚无,差异或者不平衡性并非绝对性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构成了整体的统一性。

关键词:阿尔都塞;反“目的论”;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

中图分类号: B56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13)01-02-0079-10

一直以来,学术界围绕着关于早期阿尔都塞认识论的各种争论,始终存在一个核心问题没有得到系统的论述,即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问题。^①詹姆逊敏锐地觉察到:“阿尔都塞所反击的,不只是那些命中注定要走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只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结构主义本身。这场斗争同样而且尤其是要反对把马克思黑格尔化的倾向,是要反对那些五花八门的思想传统,它们都在坚持用很容易被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所同化的语言来描述马克思的辩证法。”^{[1]519}也就是说,阿尔都塞为了重新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仅要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行批判式阅读,同样也要对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进行重新审视。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政治潮流在法国涌现,人们不惜冒着弄假成真的危

收稿日期: 2012-12-12

作者简介: 卞友江(1987-),男,山东沂水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之所以认为这是一个核心问题,并非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马克思和阿尔都塞的身份与名誉问题,而是因为这是一个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哲学认识论深刻转向的问题。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开创了与由希腊人开创的数学大陆和伽利略开创的物理学大陆相比肩的第三大陆:历史学大陆。所以,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区别的议题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理论命题,而且也是一个关于认识与历史关系的政治命题。一定程度上说,阿尔都塞尊重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他尊重历史,因为马克思辩证法在阿尔都塞那里其实是历史的代称。

② “症候式”阅读其实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的概念,强调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同一个作家在分析和批判其他人的过程中所发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将这种发现与原有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以问题的方式对这一联系提出质疑。换句话说,在阅读马克思著作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马克思所发现的其实早在以前的著作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存在的空白点,而且也要看到马克思的这种“发现”与以前著作所提出的问题之间引发的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渐渐地理解马克思,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不同,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内涵。

险,“把马克思装扮成胡塞尔、黑格尔或提倡伦理和人道主义的青年马克思”。^{[2]9}阿尔都塞以冷峻的眼光意识到了当时各种理论潮流背后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陷阱,通过重新回到马克思的著作,对马克思的所有著作进行“症候式”^①阅读,并在比较的基础上重新阅读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阿尔都塞发现了马克思辩证法与当时各种人道主义理论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根本不同。^①

一、反“目的论”:马克思辩证法的重新申诉

在重新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之前,阿尔都塞尽量地摒除了当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先入之见,舍弃了马克思头上的各种高帽——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以“症候式”的阅读将马克思著作中提出的观点与问题重新问题化。通过对马克思所有著作的阅读,阿尔都塞发现,马克思的思想根本不像当时很多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经历了一个从开始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过程。他毋宁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断裂”的过程,“断裂”最明显的标志出现在马克思 1845 年写就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②在这一“断裂”阶段之前,马克思的思想依然受制于黑格尔辩证法,确切地说,是受费尔巴哈的人本学“总问题”的影响。直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出版之后,马克思的思想才逐渐摆脱了二者的影响,走向“正确”的马克思辩证法,《资本论》则标志着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成熟。

针对当时人们对马克思青年时期作品,特别是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崇拜,阿尔都塞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作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他意识到,“如果从马克思的青年时期著作出发,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特点的问题,就势必还要提出马克思与他曾经接受、但后来又抛弃了的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提出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有何不同的问题”。^{[2]14}通过一场迂回的理论探索,阿尔都塞发现了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思想之间的联系——在写就《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即青年马克思时期,马克思其实一直处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襁褓中。尽管这一时期马克思已经对黑格尔展开了严密而带有实证性的理论、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批判,而且他还始终保持着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距离,马克思的思想依然还处于人本学“总问题”的阴影里。而至于那本特别引发争议借用了黑格

① 李其庆曾在《读〈资本论〉》的译序中对阿尔都塞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作了概括,即“(1)反经验主义;(2)反还原主义;(3)反历史主义;(4)反人道主义”的。可能也是为了将各种“主义”适当区分开,译者才对其逐一进行了解释。但是,这四种“主义”基本是相通的,阿尔都塞往往将其以“经验主义哲学”或“目的论”哲学的名称总括。狭义的经验主义很可能引向还原主义,而绝对的历史主义最终也会与人道主义走到一起。它们之所以具有相通性,就是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哲学基本上都处于黑格尔概念的逻辑范围之内,或者说建立在一种二元(本质与现象、主体与客体)对立的框架之下。这种认识论框架都承认存在本身有一个简单的起源(黑格尔所谓的“无”),承认历史本身发展的连续性。而作为具有历史超越性的认识本身是完全能够把握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和时代共存性的,所以认识本身是自明的,认识能够通过概念达到认识与现实或历史的最终统一,走向绝对的整体。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认识论框架之所以长久地统治着人们的思维框架,就是因为这种认识模式已经彻底地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一种毫无觉察的物质性存在。正因为我们对自身身边日常生活现象的见惯不怪,才觉得从这种日常生活中得出的认识是那么地无可置疑。也正是因为它那么地明确、那么地普遍,从而使这种认识逻辑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实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正如齐泽克所说,“意识形态结构要正常发挥功能,就必须服从于一个‘反常的小鬼’,以其物质存在的外在表征叙述出内在的矛盾冲突”。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著《幻想的瘟疫》一书第 2 页。

② 阿尔都塞认为,直到 1845 年写就《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开始与之前的哲学信仰划清了界限。他从马克思在其后来写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发现了这么一句话:“1845 年春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也就是从这时起,马克思开始有了自己新的问题框架。这种“新”不是原有理论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相反,是坚决的“断裂”。这一“断裂”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理论方面:“(1)制定出建立在崭新概念基础上的历史理论和政治理论,这些概念是:社会形态、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经济起最后决定作用以及其他特殊的决定因素等等;(2)彻底批判任何哲学人道主义的理论要求;(3)确定人道主义为意识形态”。参见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路易·阿尔都塞所著《保卫马克思》一书第 222-223 页。这些问题包括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的问题、自然和自由的问题、知识问题(“我能认识什么?”)、道德问题(“我应该做什么?”)与宗教问题(“我能希望什么?”)。阿尔都塞将这种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框架分成了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842 年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离康德和费希特较近而离黑格尔较远的、理性加自由的人道主义……在第二阶段(1842-1845),占主导地位的是另一种形式的人道主义,即费尔巴哈‘共同体的’人道主义”。参见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路易·阿尔都塞所著《保卫马克思》一书第 218-220 页。这样,前面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联系似乎就取消了。

尔辩证法从经济学视角论述关于人的劳动异化主题的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实际上是要用费尔巴哈的假唯物主义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2]18}马克思在1844年完成的《神圣家族》中指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同时也巧妙地拟定了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3]从中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已经从黑格尔辩证法的误区里走了出来,将辩证法“颠倒”了过来,开始从现实这个前提出发来理解问题,从人的感性直观来理解各种问题。但是马克思又在1845年写就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认为,费尔巴哈其实仍然处于德国批判哲学的舞台上,也就是说,在黑格尔哲学形式范围内构建自己的人本学。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费尔巴哈没有正确地回答“人们是怎样将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尽管费尔巴哈恢复了“人”“感性”等概念在意识之前的第一性位置,但是他还是在哲学设定的前提下兜圈子,把批判当成了现实,把概念当成了物质。“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存在世界”。^{[4]10}因为这些词句所代表的观念、意识、道德、宗教等各种意识形态是“没有历史,没有发展”^{[4]17}的。“人”这个概念在费尔巴哈那里最终沦为跟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类似的位置,他不是从实践的人而是从感性的人出发,理解人、理解自然界,费尔巴哈在打倒对手的同时,也推翻了自己。因为他不知不觉走了一条辩证法的形式路子,最终又回到了黑格尔的“起点”。这样就相应地取消了费尔巴哈自身与黑格尔之间的距离,也相应地恢复了受费尔巴哈思想影响的青年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

在一些新旧概念的共同作用下,马克思渐渐摆脱了以往费尔巴哈哲学及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模式,开始从多元的视角出发理解人与现实。

尽管《资本论》被公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阿尔都塞认为,这部著作以实践的形式隐藏着马克思深刻的辩证法思想,这种辩证法是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完全对立的。马克思明言:“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5]马克思“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着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惟一正确的思想发展形式的简单形态上建立起来”。^[6]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4]17}马克思的确是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了,可是这种“颠倒”是否就单纯地停留在从“现实”或“物质”前提出发就能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呢?也就是说,马克思辩证法的颠倒意味着术语关系位置的转变,即市民社会和国家、经济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术语关系位置的倒置,将黑格尔的“本质”——国家、政治与意识形态转变为“现象”,而其“现象”——市民社会、家庭与经济则转变为“本质”。于是,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只是经济因素的现象,而经济因素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真理”。这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难道不恰恰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形式的复制吗?尽管出发点变了,但是这种认识方式还是用一种简单本原取代黑格尔的另一种简单本原,进而作为理解现实与历史的认识方法。这就促成了“物质生活和经济这个简单本原就成了用以说明决定该历史民族的各种因素的唯一本原……这种想法最终必定把历史的辩证法彻底地降低为产生一系列生产方式的辩证法,实际上也是降低为产生各种生产技术的辩证法。这些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上有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做经济主义,甚至技术主义”。^{[2]97}

难道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仅仅是为了把我们引向另一种起源神话吗?阿尔都塞清醒地意识到,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克思所谓“颠倒”的含义,必须通过“症候式”阅读的方法来重新认识马克思辩证法。仅

① 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性的概念,诸如“私有制”“资本”“货币”“分工”“利润”“异化”“解放”等,甚至还可以将其当作《资本论》的先声,但阿尔都塞借用波蒂热利(《手稿》法文译本的译者)的看法,认为这种经济学的分析其实还是站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和黑格尔逻辑学基础上的思考。因为从《手稿》中可以看到某种“信念的存在,看到逻辑和推理赋予概念的含义,以及这种逻辑和推理本身的含义,即依然是哲学(意识形态)的含义”。也就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触及的经济学并不是经济学本身,不是资本主义现实本身,而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主体经济学),其实著作本身的归结点还是处于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总问题框架之内。

仅站在马克思肩膀上去看待问题,只会使自己陷入黑格尔辩证法的圈套,即二元对立的“目的论”^①陷阱。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运用的“颠倒”一词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没有正确地表达马克思本人的观点,将其换作“改造”更确切。因为马克思确立起来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改造,而不是“颠倒”。在《论黑格尔思想中的内容概念》中,阿尔都塞阐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内涵:“精神的概念(辩证法)只有通过它自身、而且作为从它定在的自然直接性无限返回到自身中,才成为它之所以为精神的概念”。^[7]黑格尔认为,逻辑或辩证法不仅不是一种外在的方法或工具,它其实就是不断否定自身的内容本身。“逻辑(辩证法)演变为自然以及精神的运动,既不是一种(上帝)创造行为,这种行为本身就预设了一个能担负起创造者角色的主体,也不是一种分析性的操作,不是一份存物清单。它是一个过程,逻辑理念藉此过程而占有了其自身的内容(思辨哲学)”。^{[8]79-80}阿尔都塞早先就否认了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描述为“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的看法——神秘外壳并非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而恰恰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他之后在《保卫马克思》中重申了这点,所谓的“神秘外壳根本不是思辨哲学、‘世界观’或‘体系’,不是一种可被认为同方法相脱离的成分,而是本身就属于辩证法……神秘外壳无非是辩证法本身的神秘形式而已,换句话说,它不是辩证法的一种相对外在成分,而是与黑格尔辩证法同质的一种内在成分”。^{[2]79-80}所以,又怎么能够将内容之灵魂的辩证法含义“颠倒”过来呢?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确实创立了一种新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不再回溯某个本源,也不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理解问题,而是从“多元视角”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

至此,阿尔都塞已经将“断裂”与“颠倒”这两个概念澄清,那么他又是如何面对人们认为“断裂之后”的马克思著作中依然残留的一些黑格尔概念群——“异化”“整体”——的质疑,同时又如何理解当时他所认可的革命领袖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一段话:“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 1 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9]这不得不说是摆在阿尔都塞面前更其艰巨的理论挑战,他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我们用其他比较严格的术语代替了马克思的某些仍然是模糊不清的词句,那么我们就仍然没有前进。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证据确认,马克思的叙述基本上不同于黑格尔的叙述,马克思的辩证法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么我们仍然没有前进”。^{[10]38}经过“改造”了或者“断裂”的“多元辩证法”等这些命名概念本身并不能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潜在的论述方法说清楚,必须回到概念^②本身来说明马克思辩证法的真正内涵。沿着这个路径,阿尔都塞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了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论述:概念在马克思的认识论中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它与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有何不同?对概念的理解隐含了马克思怎样的一种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与黑格尔的认识论有着怎样的区别?这种认识论最终引向怎样的历史方法论?

二、概念的“不平衡”逻辑:从历时走向共时

对黑格尔而言,“概念才是一切生命的原则”。也就是说,概念本身是自明的,对任何事物的认识(包括概念本身)其实都可以在概念的范围内达到对事物同一性的认识。“概念是‘存在’与‘本质’的统一,而且包含这两个范围中全部丰富的内容在自身之内”。^{[11]327-328}概念就是真理本身,概念通过自己抓住自己。“概念伸展出来把每一样东西都揽进自己的怀抱:在任何一种形式上对概念的任何一种把握,都只不过是自身对自我的把握。于是,‘自身没有外界’意味着外界就是自身的内部。”^{[8]111-112}所谓的“真理”其实是概念内的产物,

① 这种目的论的认识模式认为,事物的发展都是在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基础上走向统一。它以一种明晰的线性结构认为世界与历史是可以把握的,清楚地认识到“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认为历史都有一条起源、发展、灭亡的线索。这条线索不仅认为过去可以被清楚地认识,而且未来也可以很好地被预测。这种清醒的意识作为最真实而又最具欺骗性的认识形式,克服了人们无意识底下隐藏的对空虚与脆弱的恐惧,因而这种认识模式成为了所有信仰和生活的源头。

② 概念在阿尔都塞理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概念才是真正在前的。事物之所以是事物,全凭内在于事物并显示它自身于事物内的概念活动”。^[11]但是,不能将黑格尔的概念理解为一纯粹静止的术语,相反,他的概念是“一个运动,通过这个运动,结果通过把起源内在化,通过把其自身揭示为起源的起源,而重新获得了这一运动的起源”。^{[8]113}概念在这里其实就是逻辑本身,而逻辑在黑格尔那里意味着著名的三段论或三元合一性的结构,即一种正反合的图式。逻辑并不代表着一种否定的结果存在,而是作为过程本身存在的。概念在这种内在的过程中,最终目的是为了达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黑格尔建立了一种彻底而成熟的概念哲学,他抛弃了以往把概念作为外在于真理(上帝)的纯粹存在物的认识,“用知识取代了对知识的热爱”。^{[8]138}概念并非阻碍“上帝”或“整体”产生的外在他者,恰恰相反,“上帝”或者“整体”其实是概念本身的产物,而且这种整体并非作为一种结果生成物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内在的存在存在于事物或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尽管黑格尔的概念哲学并没有取消作为外在性或界限的他者,只是将其内在化了,黑格尔的“概念是一种真正的无限,它吸收和界定了从对无限的简单反思中凸现出来的伪无限”。^{[8]113}但是,黑格尔的概念所带来的只是在三段论基础上的自我封闭,概念带来的主体自由的绝对性恰恰是对主体自由的否定。黑格尔的哲学最终走向了一种历史的封闭,而历史本身恰恰是敞开的。

阿尔都塞经常援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话:“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呢?”^[12]正是鉴于马克思对黑格尔概念哲学的这种内在封闭性的觉察,阿尔都塞提出了对概念本身完全不同的看法。

每个独特的思想整体(概念)的意义并不取决于该思想同某个外界真理的关系,而取决于它同现有意识形态环境、以及同作为意识形态环境的基地并在这一环境中得到反映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结构的关系;每个独特思想整体的发展,其意义不取决于这一发展同被当作其真理的起点或终点的关系,而取决于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该思想的变化同整个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同构成意识形态环境基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的关系。^{[2]48}

这句话潜在地传达了阿尔都塞本人的认识论,即他认为概念的共时性重组要先于概念的历时性表达。也就是说,“概念结合而成的有层次的体系按照每一个概念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这一概念的定义……概念的有层次的体系决定着概念在论证表述中出现的‘历时性’顺序”。^{[10]56}概念并不是单纯的意指客观对象,也不是指向某个本源性的存在,概念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并非毫无疑问的。相反,这层关系的确立是建立在一定的共时历史条件基础上的。就像“一个名词不仅是某一个对象的代表,同时,这个名词隐含的风格、价值意味和语法关系立即包围、分解和重组了这个对象;这个名词在语言体系之中占据的位置限定了对象处于世界之中的位置”。^[13]阿尔都塞认为,对概念的同时性认识先于概念本身的历时性表达,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出对历史的科学认识。这里“同时性表示概念在被思维的整体或体系中的组织结构,历时性表示概念的论证的有序的表述中相继出现的运动。论证表述的顺序形式只是‘结构’的发展,只是概念在体系本身中的有层次的结合的发展”。^{[10]55}尽管黑格尔也强调共时性(整体)相对历时性的优先位置,但“黑格尔的整体具有这样的一种统一性,就是说,整体的每一个环节,不管是何种物质的或经济的规定、何种政治制度、何种宗教形式、何种艺术形式或哲学形式,都不过是概念在一定的历史环节上在自身中的现实存在……概念在其全部的规定中获得完全的现实存在”。^{[10]83}也就是说,“黑格尔的整体是‘思辨的整体’……这个整体的各部分彼此之间达成‘默契’,其中每个部分都是整体的部分”。^{[10]84}也“正是整体的一切规定在概念的现实本质中的这种绝对的同质的现实存在”,^{[10]83}才使我们能够对对象本身进行任意的“本质切割”,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在概念基础上达成认识与对象的统一。

所以,黑格尔的辩证法被阿尔都塞界定为表现因果观,这种“目的论”的认识逻辑其实都是在通过“现实”或“历史”的对象概念来玩弄文字游戏,企图在杀死差别基础上走向认识与历史的统一。可事实上,它并没有认识到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根本区别,以及认识对象本身是在怎样的一种既定的历史复杂结构中被界定的。“把本质看作认识对象时,它就是肯定了某种在同一时刻又加以否定的重要东西:它肯定认识对象和现

实对象不是同一的东西,因为它把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这两个对象之间的差别归结为唯一对象即现实对象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简单差别”。^{[10]26}“现实”与“历史”概念的文字游戏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对象”本身的文字游戏。如果再拿这种哲学问题的“圈子”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便会产生更大的误区。必须要打破这一封闭的认识论圆圈,首先需要“区分现实对象和认识对象的问题,同时说明对象的这种区分会导致‘范畴’在认识中出现的顺序同‘范畴’在历史现实中出现的顺序之间的根本区别”。^{[10]35}

阿尔都塞认为,认识在自身中把“现实”“历史”“实践”等具有“物质性”的对象作为具体认识、具体整体生产出来,将其作为与现实对象绝对不同的思维对象生产出来;而现实对象本身则是独立于人的认识过程之外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物,现实具体的整体是完全按照现实的顺序进行的,我们永远难以接近这个缺席的现实本身。“‘再现’‘现实’范畴的思维范畴在这种顺序中的位置不是现实历史发生过程顺序中的位置,它们在认识对象的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使它们获得了完全不同的位置”。^{[10]29}

既然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恢复了“认识对象”在认识过程中的核心位置,把纯粹客观的物质世界给悬置了,那么我们只能承认只有在认识或概念的范围内才能理解这个世界,这种观点不恰恰是一种形而上的论调吗?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丝毫没有陷入这种唯心论的倾向,“因为这里谈到的‘思维’并不是同作为物质的现实世界相对立的超验的主体或绝对意识的能力,这种思维也不是心理主体的能力……这种思维是历史地在自然现实和社会现实中产生和形成的思维器官所构成的体系”。^{[10]29}也就是说,思维并非超脱于历史之外,而恰恰是历史之内的产物。思维并非自明性地说明一切存在,思维对事物的各种“清晰”认识是与周围的意识形态环境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这些形态各异的特定历史的意识形态环境是思维的存在条件,它们通过彼此之间的差异构成一个复杂的体系结构,在此基础上,思维才有展开认识的可能性。不是思维规定着事物的认识秩序,相反,思维被一种特定历史的不平衡性结构规定着自身的规则。“这种结构把思维所要加工的对象、思维所掌握的理论生产资料同思维借以生产的历史关系结合起来”。^{[10]29-30}所谓纯粹而单一的思维主体是不存在的,“主体”这个位置的确定并非思维本身(或概念本身)确立起来的;相反,恰恰是由于既定历史的各种理论实践条件组成的复杂体系赋予了思维的主体在认识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理论生产体系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体系,它的实践是在现有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形成的”。^{[10]30}通过阿尔都塞对认识过程中认识对象的详细分析和批判,可以看到,认识对象本身并非作为一个纯粹性的概念而存在的,并非作为一种绝对的物质性或精神性的东西而存在;相反,认识对象在存在之前就经过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形式的加工,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不同于现实对象的认识对象。它经历了各种意识形态形式的装扮,才使其在其本身拥有了那么无可怀疑而最明显不过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细致的读者会发现,这种对认识对象或概念的看法是否又回到了以往的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之中,从这些学科生活的具体社会条件与意识形态语境中探寻这些存在物的价值,这不正是传统上所说的外部研究。相反的是,这种分析方法恰恰是一种内部研究,因为各种意识形态对认识对象或概念的界定并非从外部产生,而是从认识对象或概念结构内部产生的。“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10]173}也就是说,意识形态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它以其内在性消失于认识对象及认识过程本身之中,消逝在认识的机制之中。这也是之所以在这种意识形态内部难以觉察到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加以否认”。^{[1]365}从阿尔都塞借用马克思的“辩证法”对传统认识论进行分析论述的过程可以看出一种认识论的转向,即由对现实或存在问题的追问转向了对认识本身的质疑,即对认识产生的机制的质疑。阿尔都塞将这个问题表述得更加明确,“完全在思维中进行的认识过程以何种机制在认识上掌握存在于思维之外,现实世界之中的它的现实对象?或者说,认识对象的产生以何种机制在认识上掌握存在于思维之外,现实世界之中的现实对象?”^{[10]44}而对这个问题采用的批判方法便是阿尔都塞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阅读所得的“马克思的辩证法”。

马克思辩证法区别于以黑格尔辩证法为基础的传统哲学^①的地方在于,它将认识过程中的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作了根本性区分。阿尔都塞认为,认识过程根本不同于现实历史的发展过程,认识有着自身内在的结构顺序,而作为以往认识对象的现实对象,其实一直以来就没有被纳入到认识的范围。也就是说,现实(历史)本身在认识的范围内是缺席的,是难以把握的。在认识的过程中,我们理解的对象其实只是作为认识对象存在,认识最终达成的理解也只是认识与认识对象的统一,而非认识与现实的同一。认识对象,在阿尔都塞这里,并不是作为像黑格尔哲学中的概念一样,作为一个自明性存在物而存在的,相反,它受制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各种差异性的意识形态环境)。正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方式决定了阿尔都塞认识论中认识对象的位置,但是这种位置的确定并不是靠内在的统一整体来确定,而是靠生产方式内部各个层次的具体差异来界定其自身的。阿尔都塞认为,人类认识结果的取得其实都建立在既定的复杂历史结构的基础上,而不是对黑格尔所谓的简单起源的回归。一定的历史阶段有一定的生产方式,各个历史阶段及其内部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差异决定了我们的认识本身是一个差异的过程,由此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本身也是一个断裂的过程。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目的的过程”,^{[14]113}主体不存在,客体也就同样不存在,更无从谈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这就否定了以往传统哲学所固有的各种“二元对立”模式,从而实现了一场认识论的根本转移,即从同一性到差异性,从“目的论”转向反“目的论”,从历时认识走向共时认识。

阿尔都塞早期围绕着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问题所展开的与当时各种形式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辩论,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历史问题的理论探讨。在当时各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盛行之时,在人们依然还信奉的时间信念中,在人们还在不断强调主体的存在价值时,阿尔都塞清晰地意识到,一段与之前断裂的“新历史”开始了。这段历史慢慢表现出对主体与时间概念的不信任,以往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范畴再也难以拿来理解当时及以后发生的事件,历史由以往简单的线性脉络走向了复杂的不平衡发展脉络。阿尔都塞认为,历史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纯粹时间和主体概念,由于各个领域和地区历史语境和意识形态环境的不同,存在着无数种时间和主体概念,这些概念并不存在所谓黑格尔式概念的公约数,它们正是通过彼此的差异相互界定着自己。阿尔都塞认为,任何认识都是建立在既有的复杂整体的特殊不平衡结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超越这种结构的认识。但这一结构并没有成为一个先验性的本源,相反,它只是历史阶段内的产物。历史之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是断裂的就是这个原因,历史是一个“没有主体或客体的过程”^{[14]119}也是这个原因,意识形态内部“物质世界”是缺席的,但意识形态却构成了整个人类历史的内在结构。

阿尔都塞对认识过程中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的区分揭露了意识形态的可怕秘密。这种“可怕”并不在于像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都是虚假的认识(言外之意存在着真正的认识),而是在于它成为了人们现实各种物质实践必备的“工具”。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根本不存在真假的区分,它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一样是一种永恒的存在,“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的历史的整个过程中。”^{[1]351}阿尔都塞从绝对肯定的视角认为“意识形态没有历史”,^{[1]350}并不意味着意识形态成为了历史的超决定因素,取得了与马克思所说的实践决定论同等的地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上完全打破了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元区分,在他看来,根本就不存在脱离于意识形态的物质实践活动。有多少种实践,就有多少种意识形态形式,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意识形态,也不存在所谓的纯粹的实践,只有具体意识形态下的具体实践,“不存在关于实践的真理”。^{[1]229}阿尔都塞将“实践”这个概念作了重新理解,实践的过程(包括劳动和生产实践)并不是一个与意识相区分的客观过程,它其实还是一种抽象的

^① 黑格尔的辩证法在阿尔都塞那里成为传统思辨哲学的代称,因为黑格尔的哲学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黑格尔以其独有的辩证法瓦解了各种经验主义哲学和宗教哲学的体系,“上帝”“本质”“总体”“历史”等无非就是理性本身,就是逻辑本身。没有任何事物能超出这个范畴,历史是从无开始的,但又是一个没有主体的过程。如果硬要说存在一个主体的话,那就是过程本身、逻辑本身,即理念。

过程。我们通过实践得出的认识并不是从主观到客观的过程,而是一个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的过程。“我们从未离开过概念。我们只是在认识的抽象内,从结构概念和结构的最一般的作用的概念过渡到结构的特殊作用的概念”。^{[10]174}既然我们的认识都是通过概念获得的,我们又如何谈论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分?既然所有的认识或者实践都是具体的,我们又如何对对象本身作出真假的区分?既然不存在一个公认的关于实践与认识的客观标准,我们又怎么能够得出一个关于历史的一般定义,又怎么能够像黑格尔那样极尽辩证法的各种曲折最终取得关于“真理”的圣经呢?

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的结构因果观意在向我们表明的是各种宏大的历史的终结,所谓纯粹的历史根本就不存在。阿尔都塞对历史的拒绝,也就意味着对历史上各种宏大概念的拒斥,诸如“人”“主体”“阶级”“革命”“价值”“目标”“主义”“自由”“真理”“上帝”等,这些概念其实一直在黑格尔辩证法的囚牢之中,这个囚牢尽管经历了各种历史的洗礼,如今可能显得像花园一样美丽,但是这种囚禁状态却一直被辩证法压抑在人类的无意识层面而无法被人意识到。正如伊格尔顿所说:“路易·阿尔图塞提醒我们,对自身和世界的某种想象性的错觉实际上就潜伏在人的主体性结构之中。在阿尔图塞看来,如果没有这种错觉的话,人就根本不能发挥社会要求于他的功能;因此这种缺陷或错觉对于我们的本质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是人类动物结构上不可或缺的部分。……我们只有压抑进入我们的存在的决定之物,才能成为主体”。^[15]阿尔都塞揭示了人类自有历史以来就存在的悖论,人类生产了“意识形态”,而最终不得不接受“意识形态”的奴役。阿尔都塞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对认识过程的祛魅,目的就是揭露意识形态的真面孔。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整一的历史,历史本身在历时与共时层面上被无数的“小历史”所分割,不存在针对这些“小历史”的公约数即宏大历史,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是差异与矛盾维持了这种不平衡性,“差异就是现实,而且它们不仅是在各种能动性领域中、在各种实践和对象方面的差异,它们也是在功效上的差异”。^{[1]192}南帆在分析文学独特性的时候,没有从文学本身来寻找“文学性”,而是从文学与其它学科的区别来界定文学的独特性,“当经济学在强调市场和利润的时候,文学依然在谈论人格与道德的完善;当管理学在强调规则和制度的时候,文学依然迷恋于自由与人情;当法学在强调法治和秩序的时候,文学依然偏爱叛逆与温情;当科学在强调实证与精确的时候,文学依然醉心于想象与超验。”^[16]

三、结语

阿尔都塞的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之所以造成了 20 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认识论的重大转向,是因为它“呼应”了后来相继提出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历史终结论”。而他的不平衡性结构因果观至今仍然遭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他对历史与主体的悬置。他所谓的历史是一个“没有任何主体或目的的过程”,^{[14]68}似乎就意味着人类行动与反抗的意义和价值的取消,“乌托邦”的国度也在每个人的眼前永远地消逝了,随之而来的是存在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使每个受压迫的个人都感到迷惑不已,从而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后继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詹姆逊、齐泽克等都对此表示了不满,一致认为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对主体的传唤并不总是成功的,传唤的过程总会伴随着反抗与分裂。在《卡夫卡:阿尔都塞的批判者》中,齐泽克明言:“阿尔都塞仅仅谈及意识形态质询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意识形态的符号机器被‘内化’于对意义与真理的意识形态体验之中;但我们从帕斯卡尔那里得到的结论是,这种‘内化’,借用结构上的必然性,是从来不可能成功的;总是存在着粘在它身上的创伤性、非理性和无意义的残留、剩余和污点;这剩余,虽然远远不能阻碍主体对意识形态命令的完全屈从,却也正是它的条件:恰恰是无意义创伤的非整合性剩余,把无条件的权威授予了法律;换言之,就其回避意识形态而言,支撑着我们可能成为意识形态的感官享受的事物,这是意识形态所特有的”。^[17]针对阿尔都塞认为历史是缺席的观点,詹姆逊进行了辩证的反驳,“历史不是一份文本,不是一种叙事,也不是主符码或其他符码,不过作为一个不出场的原因,除了在文本的形式中对我们却是不可及的,我们

要对它及真实本身进行研究,只有先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文本化和叙事化”。^[18]也就是说,詹姆逊认为历史是在场的,而对这种在场的揭示必须借助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曲折过程,才能得出对历史整体的认识。

不管后人如何反驳阿尔都塞悲观主义者的论调,其实对于这些反驳,阿尔都塞已经在其后期的著作中一一进行了解答。从中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其实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与希望。尽管他对当时各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潮流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完全否定文艺复兴时期与启蒙运动时期人道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他也并没有完全放弃历史“整体”而遁入虚无。差异或者不平衡性并不是绝对性的,正是这种不平衡性构成了整体的统一性,但是“这里的统一性再也不可能是那种表现的统一性了:它不再表现一种简单的原则,不再使自身的一切要素都沦为现象”。^{[1]192-193}阿尔都塞对认识过程的祛魅,并不单单是为了说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一直被意识形态的乌云遮盖着,也是为了给生活引入几缕阳光。

对现实的知识也使现实有所改变,因为这种知识明确地给现实加进了它被认识这一事实,虽然一切都让我们觉得,似乎这种增加在其结果中自我勾销了。既然(对)现实的知识事先就属于现实本身,既然它无非是(对)现实的知识,那么它就只是在没有给现实加进什么东西这个悖论性的条件下,才对现实有所增加;而且一旦知识被生产出来,它不需要得到什么认可就会回到现实,并在其中消失……知识对象和实在对象的区分表现为一个悖论:肯定这一区分只是为了宣布它无效。但它并不是无效的东西:因为为了宣布它无效,就必须不断地去肯定它。^{[1]205-206}

阿尔都塞这段稍显隐晦的话似乎表明了阿尔都塞本人的政治立场,主体的反抗与行动的意义并没有完全被取消,而是对其认识更加谨慎与细微了。“如果说‘人’作为‘历史主体’的问题消失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行动的问题消失了……这也并不意味着革命政党的问题消失了……但是它的确意味着,‘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革命政党的存在、性质、实践和目标,不是由‘超越’的无上的权威即‘人’的自由决定的,而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14]65}这些不同的条件便是后结构主义所要揭示的,单纯的阶级或者意识形态概念已经难以用来解释当时出现的更加复杂的问题,诸如种族、阶级、性别、民族等各种主题的交叉,一场文化转向正悄然到来,这也正是阿尔都塞后期写就《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原因。

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是一种复杂的存在,我们不能因为一面之词而否定它,同样也不能因为其扎实的理论思辨力而一味地维护它。阿尔都塞希望看到今天的人们能够通过不断否定阿尔都塞而得出新的历史认识,毕竟,在阿尔都塞看来,历史是敞开的,历史远没有终结。

参考文献:

- [1]陈越. 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2][法]路易·阿尔都塞. 保卫马克思[M]. 顾良,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77.
- [4][德]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3.
- [7][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M]. 范扬,张企泰,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74.
- [8][法]路易·阿尔都塞. 黑格尔的幽灵[M]. 唐正东,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9]列宁全集:第5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51.
- [10][法]路易·阿尔都塞,艾蒂安·巴里巴尔. 读《资本论》[M]. 李其庆,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11][德]黑格尔. 小逻辑[M]. 贺麟,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35.
-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5.
- [13]南帆. 关系与结构[M].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174.
- [14][法]阿图塞. 自我批评论文集[M]. 杜章智,沈起予,译. 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

- [15][英]特里·伊格尔顿. 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 马海良,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96-97.
- [16]南帆. 冲突的文学[M]. 镇江: 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0: 12.
- [17][斯]斯拉沃尔·齐泽克.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 季广茂,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61-62.
- [18][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M]. 王逢振, 等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6.

Anti-Teleology: Althusser's Causality of Unbalanced Structure

BIAN Youji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arguments on Louis Althusser's epistemology,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Marxist dialectics and Hegelian dialectics. Louis Althusser, by returning to Marx and his writings, states the basic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Marxist dialectics and Hegelian dialectics and thus forms a new epistemology in his mind. The difference of this new epistemology from the traditional one, which is based on Hegelian philosophy, lies in the fundament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cognitive object and the object in reality in the course of cognition.

Key words: Althusser; anti-teleology; causality of unbalanced structure

(责任编辑: 江 雯)

(上接第 78 页)

Shock and Game: Classical Educ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WANG We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Fuji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studies have profoundly changed the survival stat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e symbol struggle within the cultural space is fierce.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a reflexion of the reconfiguration of cultural capital of liter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syndrome of marginalization of literature as well as humanities as a whole. Nevertheless, the classics will never draw to a close or end up in paralysis since the extension of age structure will remain to some extent its continuity and stability. Classical literature still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part of literary education in which the relationship of "giving" and "taking" should be handled properly, and the "model answer" complex be dropped.

Key words: cultural studies; literary canon; literary education

(责任编辑: 江 雯)